

陈
晋 著

毛泽东之魂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陈
晋 著

毛泽东之魂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之魂 / 陈晋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060-7420-9

I. ①毛… II. ①陈… III. ①毛泽东 (1893 ~ 1976) — 人物研究 IV. ①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5121 号

毛泽东之魂

(MAO ZEDONG ZHI HUN)

作 者: 陈 晋

责任编辑: 王 艳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36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7420-9

定 价: 42.80 元

发行电话: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4258029

目 录

第一章 毛泽东眼里的“毛泽东”	1
一、青年时代：“性不好束缚”，表面“意强”、实际“意弱”	1
二、红军时期：谈陈独秀和自己。为什么向斯诺敞开心扉？	6
三、延安整风前后：面对夸赞。“你以什么权力在这里指导政府和军队？”	10
四、40至50年代：“我的思想体系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13
五、50年代前期：搞个人迷信不好	18
六、50年代：请斯大林派人“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	21
七、50年代后期：不当国家主席，“个人威信不会……有所减损”	25
八、“大跃进”及其以后：经济工作“不懂”，“这一辈子搞不了了”	29
九、庐山会议及其以后（一）：“偏听偏信，就是要偏”，“领袖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	33
十、庐山会议及其以后（二）：回顾历史，“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37
十一、60年代：肯尼迪“也看我写的军事文章，这可能是真的”	39
十二、60年代中期以后：“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做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42
第二章 在逆境中	48

第三章 不摸枪的统帅	60
第四章 心灵的旗帜	69
一、“我不信邪，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69
二、要干到底：“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75
三、用四个字支撑一条路	80
四、什么能使他变得年轻？	87
第五章 为什么喜欢游泳？	98
一、为自己的健壮身体而自豪	98
二、“七级台风，在海里游泳很舒服”——是指政治？哲学？ 还是人生？	102
三、在历史里寻求“同志”	107
第六章 为什么喜欢孙悟空和《水浒传》？	111
一、“猴气”和革命家	111
二、“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丢掉了天条”	116
三、《水浒传》：革命的“教科书”	120
第七章 永远的漫游家	128
一、“我自欲为江海客”	128
二、毛泽东在山川物象里找到了什么？	132
三、面对自然景观的愉悦和提升	137
第八章 读书与治国	143
一、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	144
二、一本书和两场运动	151
三、三本书的政治畅想	160
四、两本书反思“大跃进”	171

第九章 不怕“鬼”的背后	176
一、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说“鬼”？	176
二、多事之秋在西方电讯上的批示	180
三、“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编成一本书”	184
四、打鬼：庐山会议上有人替毛泽东“找到了几挺机关枪”	187
五、“我也六十多了，就是不怕鬼”	192
第十章 另一个世界的“我”	200
一、政治雄才与诗国骄子	200
二、诗雄与雄诗	206
三、一个火辣辣、威逼逼的“我”	210
第十一章 孔夫子乎？秦始皇乎？	214
一、苦读“圣贤书”。“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214
二、讲秦始皇，林彪插话自讨没趣	218
三、“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	220
四、反对孔夫子的书，我“都注意看”	223
五、“批林”为何连带“批孔”？	225
第十二章 出入佛道	230
一、我们和佛教在为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230
二、禅宗反对教条主义，使“佛教中国化”	234
三、搞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	238
四、《老子》的启示	240
第十三章 经济天下——在历史的对话中	245
一、黄老与申韩：为君之术	245
二、进言与纳谏：用人之道	249
三、史论与疏奏：治国之策	253

四、军谋与战略：统兵之法	257
第十四章 “五帝三皇神圣事”——评说历代帝王	264
一、“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商纣王帝辛	264
二、“老粗出人物”——汉高祖刘邦	266
三、败于不肯纳谏——楚霸王项羽	268
四、“儒学治国”的衰国之君——汉元帝刘奭	271
五、“这个案要翻”，不能贴他的“大字报”——魏武帝曹操	273
六、登基“可谓奇矣”——南朝宋明帝刘彧	277
七、其做法“蕴藏大乱”——隋文帝杨坚	278
八、“遇事无断制”——唐高祖李渊	278
九、自古以来最能打仗的人——唐太宗李世民	279
十、狡猾过于曹操——后梁太祖朱温	281
十一、“生子当如李亚子”——后唐庄宗李存勖	281
十二、“此人不知兵”——宋太宗赵光义	283
十三、知识分子型的皇帝“没有出息”——南朝陈后主、 隋炀帝、南唐李后主、北宋徽宗	283
第十五章 出将入相——喜欢和鄙薄的“干部”类型	285
一、两个好典型：“多谋善断”的郭嘉，“劳谦”仁厚的韦睿	286
二、两个不成大器的“主公”：“多端寡要”的袁绍，“虚 有其表”的刘表	290
三、四个坏典型：“无行”的郭象，“庸人”王建，“笑里 藏刀”的李义府，“能伸而不能屈”的刘幽求	294
第十六章 在书斋里	296
一、屈原：“手中握有杀人刀”	296
二、心里没有气，他写诗？	298
三、诗人们的矛盾	300
四、不废婉约，宜读《文选》	301
五、引诗证史	306
六、还是旧的民歌好	308

七、读韩说柳·····	311
八、“杂书”有益·····	314
九、史学一家言·····	317
十、古为今用：“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320
第十七章 苍凉唱大风 ·····	325
一、面对死亡·····	325
二、晚年心事·····	330
附：“毛泽东之魂”问答录 ·····	336
一、打开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窗户，我们看到些什么？·····	336
二、遭遇新旧交替的中国，他是最“时髦”的现代型人物， 可又拖着博大深长的五千年传统·····	339
三、劈成两半的个性世界，怎样合成完整的人格？·····	342
后记 ·····	349

第一章 毛泽东眼里的“毛泽东”

谈论领袖人物的性格，挖掘他的内心世界，当然要依据他的所言所行，借助他做事做人的外在表现及其客观效果。有距离，可以客观些，但也常常难免隔雾看花。有时候，如果从他们自我解剖的话里话外来分析，可能会弥补隔雾看花的不足。而成就了大业，特别是那些被认为伟大非凡的人物，一生的历程从来都曲折起伏。在他们艰难跋涉或顺达开怀的时候，常常伴随有灵魂的独白漫语，伴随着真诚的自我解剖。此类反思心迹，多少是他们得以成功并且伟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助力。

一个人在自己的坎坎坷坷的经历中，怎么会没有灵魂的独白、情感的波涛和真实的反思呢？没有这些而让人尊重的伟人，还真没见过。

毛泽东很推崇鲁迅，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

匆匆几十年过去了。带着人们不相信他的自我解剖的遗憾，毛泽东也谢世 20 年了。

现在无疑是该信的时候了。

可话又说回来，伟人的自我解剖，未必能反映他自身的全貌。有时未免谦逊，有时未免责己过严，有时则是出于微妙的政治需要……

于是，毛泽东眼里的那个毛泽东，自然就是打引号的了。

一、青年时代：“性不好束缚”，表面“意强”、实际“意弱”

在毛泽东留下的文字里，最早谈论自己，分析自己性格的，是 1915

年8月写的一篇日记。他为这篇日记起了个一目了然、近似严酷的题目，叫《自讼》，好像是自我控告一般。这篇日记是用文言写的，翻成白话，毛泽东说的意思是：

有一天，来了位客人，告诉我：知不知道一种野生的匏瓜，它的枝叶粗蔓，像杂草一样，人们都不注意它，可到秋天的时候却能长出累累硕果；相反，那些花园里的牡丹，在春天里争艳斗妍，雍容华贵，很惹人喜爱，可一旦秋至凉归，便花谢叶枯，随风飘散，一无所留。你这个莘莘学子毛泽东，在做人的方面，对这两种东西，愿意效法哪一种呢？

我回答说：我愿意效法能留下果实的匏瓜。

不料来客却说：你是这样说的，你实际上并不这样做。我看你刚刚有了点本事，就急于在众人面前表现，而且还喜欢招朋引类，号召别人。在作风上，有张扬浮嚣之气，没有沉静淡泊之心，外强中干，爱沾沾自喜。这样下去，难道不是在学牡丹的样子吗？那是不会有成果作为的呀！可你却说愿意学匏瓜，岂不是诡辩？岂不是在糟蹋你看重的匏瓜吗？

我听了这位客人的责问，真是无言回答，羞愧得汗都出来了，出气都难受，非常沮丧，只得狼狈而退。

这篇日记里把自己“骂”得够痛快淋漓的了。不知道是真有人这样当面同他深谈进而责问过他，还是为了自省，在沉思中想象着并以文学的笔法来解剖自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所说的自己的这些缺点，如“浮嚣之气”，多少是存在的，他不会无端地这样妄自菲薄，这样严酷地审视自我，哪怕是在文学的想象里面。

最有力的证据，是他把这篇日记毫无保留地抄在一封信里，寄给了堪称“师兄”并交往甚深的好友萧子升。一个浅显的道理，足可说明青年毛泽东的这个“自讼”是真诚的：愿意在朋友面前表露自己当时的性格弱点，无疑比只在日记里解剖需要更大的勇气和诚实。

这事发生在1915年，毛泽东进一师读书的第二年。那时，他22岁。这期间他好像是在集中地反省自己。

7月间，他在一封信里，曾流露出对学校的不满，认为自己“近年来

所有寸进，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难得者多”。由此，产生了退学的念头。11月间，他又向大不了自己几岁的老师黎锦熙倾吐心声，说自己入学以来，由于“性不好束缚”，始终觉得学校“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

看来，初入长沙这所有名的学校，毛泽东还不大“合群”。可能他内心的某些想法曾对他信任并尊敬的良师益友、湘潭同乡黎锦熙倾吐过，9月间，黎去北京谋职前，曾反复叮嘱他注意循规而学，谨慎从事。可仅两个月时间，尽管毛泽东“孳孳不敢叛”，但这种自我压抑，无疑更使他难以忍受，实在受不了学校的这种气氛，在这里感到简直是浪费时间，才坦率地写了这封信。

他不满意这所学校的原因，大致是：

（一）自己的性格不愿意受到什么规矩的束缚，在学校各种规章制度面前，觉得意志不自由；

（二）教学程度不如自己期望的高；

（三）相互往来的“俦侣”也不好，甚至“太恶”。

很明显，毛泽东当时看人评人相当苛刻，也就显得卓尔不群，乃至“孤芳自赏”。

于是，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写了一个征友的启事，张贴各校，有五六十个人来应征。在这封信中，他告诉黎锦熙，这是近日唯一一件让他稍觉快慰的事情。再一件事，也是在这封信中透露的：“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也就是要退学另谋他处学习。

可能是由于其他人的劝阻，毛泽东终究没有退学。不久，他当了学生会干部，干得兢兢业业，煞是认真，做了许多让师生们都说好的事情，慢慢也不再想退学的事了。

再后来，他一心扎入救世济民的大道理的探寻之中。他觉得世上有一些人，四处说大话，滔滔不绝，一般人都把他们当“贤者”看，把他们说的话当真理来奉行。读了一些书，对照纷纭世事，毛泽东认为这些人给社会开出的各种药方，都是枝微末节，没说到根本处。他觉得根本的药方是找到一种叫“大本大源”的东西。由此，反观自己，他于1917年8月给黎锦熙写信，再次坦露心迹，说自己近年言行，“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下决心“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想想，自己快要毕业了，可还没有得到真理，还没有确立未来的志向，对人生，对国家，对教育，采取什么主张，都“茫乎未定”。毕业以后干什么呢？他告诉黎锦熙，去教书，去办事都是下策，“自思读书为上”。

其实，他毕业后，并没有时间去读书，组织新民学会的各种活动以集合群体，创办《湘江评论》投入五四运动，领导驱张运动干预湖南政局，开设文化书社以传播新文化……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考虑建党的事情了。

真是忙得够呛。毛泽东似乎天生不图清静和“独善其身”。搞这些社会活动，人事间免不了有一些争论，常有不痛快的时候。就在思想发生根本变化的门槛内外，不大愿意迁就于他人的毛泽东，再一次注意到自己性格中的一些弱点。

正好，新民学会一个叫罗学瓚的，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一封信，说到人们待人处事，常常出现四种错误，一是感情用事；一是看问题以偏概全；一是不考虑事物间的因果联系，把现象当作结局；一是以主观代替客观事实。

毛泽东于1920年11月26日，写了封回信，作了一番自我解剖：

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的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

感情用事、因人废言这些性格缺点，都难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向上进步的团体中，应当倡导一种什么样的人格呢？

几天后他就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在给法国的蔡和森等人的信里，他提出，新民学会的成员所应该有的人格特点是：第一要有“互助互勉”之心；第二是诚恳，不圆滑；第三是光明开朗；第四是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

这个时候，在长沙的两个重要的新民学会成员彭璜和易礼容之间闹起了矛盾，彭璜找毛泽东谈了一次，说到不愿意与恶人共事，这大概是对易

礼容的怨忿之词。也说到要“征服”易礼容等。此外，还说自己和毛泽东相交，常常觉得毛泽东意志太强，不免引起要“反抗”的想法，云云。

1921年1月28日深夜，在外奔波一天的毛泽东为调解彭璜和易礼容之间的矛盾，写了封长信。指出了彭璜身上的性格缺点，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这两年多来，几乎把过去的修养都破坏了，“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

然后，一一指出了彭璜的十个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

“论人喜苛评”的毛泽东也承认，以上性格缺点，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他自己“一概都有”。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自己说话办事，态度还算明朗爽快，能够择善而从。但感情用事，自视很高，责人严，虚荣骄气等，则概莫能免。

最后，毛泽东向朋友坦陈了自己过去“不好意思向人公开”的一个“最大缺点”——“意弱”。

这大概是对彭璜说毛泽东平日做事意志太强，有时强得难免刚愎自用、强加于人的一个解释。毛泽东的解释是：“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意弱的表现。”

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用今天的话来说，大概就是用强悍执拗乃至咄咄逼人的待人处事方式，来掩饰自己意志脆弱和不太自信的一面。

毛泽东当然也不是无端地糟践自己，一味以贬损自己来安慰彭璜，让他听得进自己的意见和劝说。虽然不免有讲究劝说方式这个成分在内，但太看不起自己，决非毛泽东所为或所愿为。所以，他在信里也肯定了自己做人处事的优点：“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为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这又见出他的自信，并使自我解剖更全面得体，进而真实了。

正是明明白白地带着这些性格上的优点和弱点，总想做点事情干出经国大业的毛泽东，走进了刚刚呱呱坠地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在这新生的一群人身上，当然都同毛泽东一样，还连挂着那个催产的时代母体的

脐带……

二、红军时期：谈陈独秀和自己。为什么向斯诺敞开心扉？

从1921年建党到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以前，毛泽东谈论自己、分析自己的言论不多。

这大概是因为：东奔西跑，事务繁杂，且千变万化，没有沉下来反思自己的环境；无论是革命的道路还是自己的经历，都曲折起伏，处于实干应急之中，在党内还没有形成特殊的地位，无需多谈自己；也可能是有不少解剖自己的言论，但战事频仍，没有保留下来。

不过，在大革命失败和土地革命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有一处说到自己的材料，尽管并非专为解剖自己。而在土地革命战争就要结束，抗日战争即将开始的时候，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系统地谈了自己的历史。其间的跨度，正好十年。为表述方便，我们把这十年称之为“红军时期”。

先说第一个材料。

那是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谈到农民问题，毛泽东说：

当我（1927年1月）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立场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产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

这段话表明：（一）在1927年1月以前，他对中央的决策虽不同意，但对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主要是农民问题）还没有明确坚定的意见；（二）在湖南从事的农民运动的调查，对他形成自己的观点，起了关键作用；（三）在当时，他对中央的“领袖同志”还是很信任的，在意见分歧

的情况下，他没有坚持己见。

这里说的“领袖同志”，自然就是引导毛泽东走进共产党队伍的陈独秀。

若干年后，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谈起陈独秀，说他那时的日子则“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

矛盾中的陈独秀，其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是主张二次革命的。在大革命后期国共分手在即且势所必然的情况下，陈独秀往右拐了，毛泽东则向左拐了。一度是毛泽东信仰共产主义的导师的陈独秀落伍了，“学生”毛泽东前进了。毛泽东的上级、整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陈独秀被历史抛弃了，毛泽东被历史选择了。

可是，后来被历史选择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并没有完全鄙薄和否定陈独秀，他一生都对陈独秀怀着感情，并把陈放在自己的成长历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来肯定和叙述。

那是十年后在陕北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第一次向世界坦诚敞开自己的心扉的时候。

他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对我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里说的是1920年的事情。

此后，1942年“整风”时期，1945年党的“七大”，以至到1962年和70年代，他都说过，陈独秀是有功劳的，将来写党史，还要说到他的。尽管建国后到“文革”期间的党史里，陈独秀几乎完全是一个反面角色，可毛泽东不管这些。

且回到他第一次叙述自己历史的情况上来。

在山沟里，向一个外国记者如此详细回述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很容易做出的决定。据斯诺后来说，刚开始的几天，他们的对话好像是在捉迷藏，闪烁其词的，总是深入不下去。聪明的斯诺无疑会感觉到，毛泽东是在通过绕圈子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能不能把自己的真实历史告诉这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会不会滥用自己的信任来歪曲或误传自己的话？

斯诺急了。终于，有一天径直问毛泽东：“如果你想结束内战，首先得让全国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多年来的宣传把你们描绘成堕落、愚

昧、无知识的土匪，光知道烧、杀、掠夺，还有共妻，你们必须让人了解你们是活生生的人——不能光靠政治口号。”

毛泽东又一次回避了这个问题。可他心里并不是没有在盘算。

从原则上讲，共产党人本来是回避谈论个人的事情的。斯诺的浓厚兴趣和使毛泽东也感兴趣的提问，还有那一脸真诚，不会不使他动心。更重要的是，这位来自西方的年轻记者，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媒介，通过他，可以向世界，更是向中国发表谈话。这个机会是难得的，也是头一次碰上。因为一个明显的道理是：过去实际上被剥夺了向全中国公开发表意见的可能，斯诺一旦用英文发表出来，尽管国民党新闻机构万般阻挡，也会传到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耳朵里。被称为土匪的共产党人，何尝不急于想让外界了解他们的经历和追求呢？再说，斯诺还告诉他，外间传说毛泽东已经得肺结核病死了。

结果，又一天晚上，斯诺拿出了关于毛泽东个人历史的一个“清单”，在毛泽东还拿不定主意是否为澄清关于他个人问题的一些流言蜚语而花费时间的时候，斯诺用起了激将法：

“你不是说过你曾受到乔治·华盛顿的为人和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一书的鼓舞吗？”

毛泽东又拿起清单细看了一遍，终于提议：“让我概括地把我的经历讲给你听好吗？我想那样更好理解些，而且最后你提出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得到回答，只不过不按这个顺序罢了。”

此后连续几个晚上，毛泽东搁下大堆报告和电报，取消一些会议，根据自己准备的提纲开讲了。斯诺觉得，毛泽东给他说的，“是一份大致完整的自我分析以及对一代革命者的叙述”。

毛泽东对自己的成长过程，不作虚饰。小时候的情况不用说了。说到他青年时代的思想探索以及世界观转变前后，给人印象很深的，是他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以及胡适、陈独秀一度成为他的偶像；还有，说到在中央苏区时的沉浮等，都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让人觉得是一个活生生的带着露水珠的毛泽东。

让斯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开始还都是个人的历史，讲到参加革命以后，便是党的历史，红军的历史了。

毛泽东不能不这样。本来，向外国记者谈个人历史，在党内就已是破天荒的事了。他首开此举，不光是对国内外有一种宣传上的需要，对在党

内刚刚起决策作用的毛泽东来说，恐怕也是件很有益处的事情。那时，他还不是名正言顺的“第一把手”，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问题还在于，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张闻天，中共的上级——共产国际到底持什么态度，是否认可，都是未定之数。因此，说早期历史，个性化点倒也无妨，一旦自己的经历融到整个革命事业以后，过多地宣传自己显然不大合适。

毛泽东谈自己的时候，没有要把自己树立为权威的意思。斯诺 1939 年重返陕北采访毛泽东后，在《为亚洲而战》一书里，曾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做过比较。他说：“毛和蒋之间有着突出的相似之点和相异之点。两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毛为了自己的事业，大概可以同蒋一样地无情。……蒋是一个内向的人，他似乎时常有意强调自己超脱于群众之上，以保持中国关于权贵的传统。毛则一点也不神秘。他并不声称自己是永远不犯错误的。我听到过他承认犯了错误，而且他并不因为改变自己的主意而感到羞耻。”

毛泽东或许没有明确说过他自己用什么方式来领导他的人民和军队，但有一点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即他在处理自己和“下面的人”的关系时，绝不愿通过有意表露威严来树立自己的权威。他时刻提醒自己，要靠自己的政策正确与否，当然还有难以掩饰的那种人格魄力，来确立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在这种时候，他和普通老百姓及一般干部之间的亲密交往，不仅不丝毫损碍他的权威，相反，是大大地相得益彰。

他和人民的交往，使 1944 年到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包瑞德惊叹：“如果有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事，但事后逃脱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如果包瑞德先生知道这样一件事——

当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说了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不仅没有去审查严办，反而从中反省出自己的征粮政策给老百姓压的负担可能太重了，从而发动一场大生产运动来解决粮食问题。——他或许会为自己的感慨找到答案。

再说，那时还只偏据一隅之地，人员、政情都还不十分复杂，毛泽东的目标是夺取全国政权。喜欢“下层”，也是他天然般的性格内容。对他的这种优势，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也就自觉地这样做了。